

# 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用主义风潮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例

裴安平

实用主义最早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露头，是一个哲学流派。它的理论核心就是有用的就是真理，无用的就是谬误。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实用主义的核心理论也有过类似的总结，即“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考古学不仅慧外秀中，在绚丽多彩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的同时，有关发现属性与内涵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史前血缘社会的研究日趋简单空泛，并成为了一个研究理论实用主义泛滥的领域，各种来源不同属性不同的“有用”的理论和理论部分各得其所并行不悖。对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文简称“探源”）就是典型。

—

为什么中国考古学今天会成为实用主义泛滥的学科？为什么实用主义会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主要有三个原因。

## （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需要的推动

从表面上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当代考古学实用主义泛滥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个“探源”工程直接推动了实用主义的普及、利用与合法化。

21世纪一开始，国家就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然而，拿什么去探源呢？又拿什么去认识和理解文明之源呢？

根据“探源”课题的设计与总结，2001—2003年是“预研究阶段”。其中，公元前2500—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是工作的时空范围；“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相关的子课题就是“预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最主要的“预研究”成果就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sup>2</sup>。

显然，“探源”工程表面上完全不需要，也没有涉及和讨论任何理论问题，因为只需要“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即可，即考古学与历史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可。但实际上，最后的收获却清晰地表明“探源”工程什么理论都用到了，而且是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哪个部分好用就用哪个部分。在关于考古学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的论述中，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和思想就影响明显<sup>3</sup>；在关于国家和文明关系的认定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就影响明显，国家就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起源就是文明的起源。此外，在聚落形态的研究与国家的认定中，西方欧美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和突出。

毫无疑问，上述阴阳二方面的现象表明，“探源”工程不是不需要理论，而是不能直说要用什么理论，因为要为实用主义开方便之门。

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实际，西方欧美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在中国先后就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末是第一阶段。于此阶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国外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学说纷纷传入中国。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个别学者的个体行为，并多停留在简介与推荐的层面上。从21世纪开始是第二阶

<sup>1</sup>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13页。

<sup>2</sup>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北京：《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第12版。

<sup>3</sup>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北京：《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第12版。

段，由于“探源”工程的实施，“区域聚落形态”理论在中国开始进入了生根、开花、结果的新时代，因为“探源”工程的利用不仅具有高级的示范作用，高级的合法、合理性与权威性，所以“区域聚落形态”理论在中国迅速普及并站稳了脚跟。

值得深思的是，一个最需要理论，最需要从理论的层面才能探到国家与文明起源的本质与特点，探到人类社会是如何从母系社会发展为地缘社会，发展为国家社会的原因和过程的课题却自己不搞理论？

为什么？

这说明，“探源”工程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科学严肃的学术课题，而是一个明知中国缺失探源理论而为之的工程；所以，它不需要理论建设，只需要为实用主义敞开大门，为各种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好用就大加利用敞开大门。

就这样，在“探源”工程的推动下，实用主义在中国考古学界到处泛滥，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新特点。

## （二）现代社会名利需求的推动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新时期“一带一路”的不断延伸，也随着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目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往的考古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冷僻分支，大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考古学的目的也只是复原历史研究历史。但是，现代考古学与以往完全不同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增添了许多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宣传、弘扬和保护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遗产的品质和地位，并为地方文化事业和旅游提供服务。此外，考古发现还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了，与项目和经费挂钩了，与考古工作者个人的名利挂钩了。为此，考古人欢欣鼓舞，专业自豪感大涨，发现与研究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前考古发现主要是为研究服务，为研究提供资料和证据；但今天，研究的地位下降了，研究开始为发现服务，为提升新发现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服务；于是，一批世界第一、中国第一、长江流域第一、黄河流域第一的发现很快就超越历史在各地出现了<sup>4</sup>。其中，“河洛古国”的诞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sup>5</sup>。因为，在西方欧美“区域聚落形态”的视野下，“探源”前期的研究不经意就造成了中原地区可能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洼地”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原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地位和重要性。于是，专家们很快又根据“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以遗址规模大特别有内涵为由，让文明起源的“洼地”翻身变成了文明起源的“高地”，变成了黄帝时代的都城<sup>6</sup>，变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引领之地。然而，周边的“高地”遗址不仅一个个都比双槐树面积大还更有内涵，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山西襄汾陶寺即如此；而且与“河洛古国”也不属于同一文化，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在文明起源中也根本引不动它们。对此，专家们视而不见。这就是一种实用主义，顾头不顾尾。

显然，“河洛古国”的产生正是社会需求推动研究，研究推动理论实用化，理论实用化又推动“洼地”变“高地”的杰作。

## （三）学术垄断

所谓“学术垄断”，就是利用权力压制、打击和封杀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持不同观点的人，从而左右学界形成学术观点基本一致的假象。

在中国，考古学界之所以实用主义猖獗，与学术主流和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垄断言论与行为也有明显关系。因为，伴随着“探源”工程的实施学术界就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但都遭到了有力的压制、打击和封杀。

本人曾于2004年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理念，同时也提出了通过“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史前血缘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再以史前血缘组织为载体

<sup>4</sup> 裴安平：《上山文化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www.peianping.com](http://www.peianping.com)/新文稿；

裴安平：《质疑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的学术泡沫》，[www.peianping.com](http://www.peianping.com)/新文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sup>5</sup> 裴安平：《“河洛古国”是真的吗？》，[www.peianping.com](http://www.peianping.com)/新文稿。

<sup>6</sup> 王丁等：《伊洛汇流黄河处 追溯中华文明主根脉——河南巩义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郑州《河南日报》，2020年5月8日，第4版。

为平台复原和研究史前社会形态与历史的理论和方法<sup>7</sup>。对此，国家社科基金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其中，《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2010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普通项目，2013年项目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sup>8</sup>，2017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并翻译成英语出版<sup>9</sup>；2017年，本人基于史前聚落群聚形态而从事的《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研究，也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sup>10</sup>；2019年，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并翻译成英语出版。但由于指导思想、研究理论与“探源”工程完全相左，我的学术理论和成果完全被考古学“冷冻”并“封杀”了，至今无人问津，既没有一篇简介，也没有任何书评。

此外，从1985—2007年的20多年间，本人在《考古》、《文物》、《中国文物报》先后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但2007年以后至今近15年内，一篇都没有发表，所有投稿都被退回来了。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所有与中国史前考古理论和文明探源有关的学术会议，由于我喜欢“放炮”，也从来没有人邀请我参会。

2015年12月，本人在湖北天门“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文明探源，源在何方”的发言，触犯了“探源”工程的大忌。事后，在编辑出版研讨会论文集的过程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编委多次接到北京有关人员的电话，要求他们撤销我的论文。最后，在湖北同行的坚持下，我的论文成了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sup>11</sup>。

2016年8月，作者应邀出席了陕西神木石峁“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提交的论文依然还是《文明探源，源在何方》，从而引起了会议组织者的不满，所以会议期间被历史性地即从业40年以来第一次在考古会上被同行发配到会议科技组去发言，成了科技组唯一的考古人。为此，作者也曾向会议组织者提出过希望回到考古组发言的请求，但没有答应。会议最后的总结大会上，各组都有负责人介绍了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而作者之言则无人提及。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也说明一些学者和学术带头人越来越像政客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与面子，甚至不惜利用掌握的权力压制和排斥不同意见与观点。与此同时，也说明现在多么需要净化学术氛围和空气，净化人的心灵，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避免学术垄断与实用主义泛滥。

## 二

根据“探源”工程的实施与成果，可以得知当代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实用主义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的学说，第二部分就是苏秉琦先生的有关理论和思想，第三部分就是西方欧美目前流行的理论。其中，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表”，作用主要在于掩护和支持第三部分的利用，并证明第三部分相关利用与研究成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三部分是“里”，是中国史前聚落考古最需要最实用的理论，舍此将根本探不到中国文明与国家之源。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实用主义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要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都错了，而是要说我们今天的考古和学者不能在实用主义目的的驱使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对号入座。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不仅年代早，1884年，也就是近140年以前；而且当时无论历史资料还是民族学的资料都很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考古资料就完全等于零，因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就不免阶段性地域性成果的意义，就给今天的继续发展留下了余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史前和古代遗址被发掘出来，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历史鲜明的自身特点，还为人们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还原历史研究历史，自觉地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中国考古人和学

<sup>7</sup> 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北京：《考古》，2004年，第11期。

<sup>8</sup>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sup>9</sup> Anping Pei, *A Study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pringer, 2019.

<sup>10</sup>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sup>11</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然而，由于“探源”工程必须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探到文明和国家之源，又由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都是在西方欧美“区域聚落形态”理论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在中国就特别需要建立这些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并用这种联系来作为外衣和护身符，以此掩护并证明其成果所具有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此，“探源”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实用主义，有取有舍；另一方面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发现视而不见熟视无睹。

第一，选择了简单实用的“文明”概念。

关于“文明”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二种不同的表达。

1844年，在《英国现状·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sup>12</sup>；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又指出：“国家就是文明社会的概括”<sup>13</sup>。对此，“探源”工程选择了后一种说法和表达，因为从考古的角度来看，证明文明“是一种社会品质”将要涉及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各个方面，将要比证明“国家就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涉及的问题和证据多多了，因而也难多了。

可是，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考古学早就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大约距今8—6.5千年，中国考古发现当时的人类社会出现了3个前所未有的变化<sup>14</sup>。

第一，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等级地位分化，出现了衡量等级地位的奢侈品。

第二，聚落与聚落之间也出现了等级地位分化，出现了核心聚落和从属聚落。

第三，出现了真正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在河南新郑唐户和浙江嵊州小黄山，核心聚落就住在壕沟里，从属聚落就住在外面

大约距今6.5—5千年，中国的考古又发现当时的人类社会出现了8个前所未有的变化<sup>15</sup>。

农业成为了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转变为土地耕作权私有的早期个体劳动；

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广为普及，个体家庭成为了血缘社会最小的独立的组织与经济单位；

母系社会变成了父系社会；

财富私有制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贵族；

个人开始由集体中的个人变成了集体中的独立个人；

社会由分散开始走向一体化的整合与统一；

中国史前第一代城址正式崛起，湖南澧县城头山即是。

然而，为了尽快完成“探源”的任务，尽快让“国家就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成为中国的历史，工程对上述考古新发现一律视而不见。实际上，文明与国家不是同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文明起源的时间明显早于国家，国家是文明起源社会文明化的结果。否则，国家就不可能概括出生早的文明，而且也没有可供“国家”概括的出生早的“文明”。

第二，无理证明“文明”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物。

为了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合理性，也为了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探源”工程简单地附和了马克思主义，也以为中国的“文明”起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结果。

2020年初，“探源”专家在《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一文中认为文明起源就是“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的结果，而“生产力获得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然而，中国考古发现表明，“探源”的论述一方面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附和，另

<sup>12</sup> 恩格斯：《英国现状·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6页。

<sup>13</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sup>14</sup>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5—346页。

<sup>15</sup>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6—352页。

一方面无视了中国的考古发现，缺少深入和实事求是的论证。

1、史前“农业显著发展”与“文明”起源的时间并不匹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物普查结果早已证明，近万年以来中国的史前农业经历了前后二次“显著发展”。第一次，距今6千年前后；第二次，距今4.5千年前后，各地都出现了在同样适合农业的土地面积范围内，聚落遗址数量与规模都大幅增长的现象，以致实际养活的聚落和人口数量成倍成倍往上翻。与此同时，每一次农业大发展也都与距今5千年的“文明”起源无关，或早或晚。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史前农业前后二次“显著发展”的考古事实很难发现吗？显然，不是的。关键在于只要承认了就失去了“文明”起源与农业“显著发展”相互匹配的联系，也就同步失去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作用的联系，失去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为此，一个真实的“显著发展”都不能承认，只能泛泛地用实用主义一带而过。

在文章中，“探源”专家还举了良渚文化的例子，如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田”、“牛脚印”、“石柄石头犁铧”等，来证明当时农业已出现了“显著发展”。但是，他既没有说明为什么良渚文化一地之发展就能够代表全国，为什么江南的水田农业就能够代表黄河地区的旱地农业？显然，这种举证不仅与科学合理差距较大，而且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论证方法。只要有用的就尽量利用，至于合理与不合理，合多少理，都另当别论。

2、史前从未出现过地缘社会的农业与手工业分工<sup>16</sup>。

由于史前一直是血缘社会，又由于夏商周时期国体虽然已经地缘化了但政体还是血缘化的，各民族包括统治民族的基层组织还是血缘化的；所以，商周及以前中国就根本不存在地缘社会特点的“社会分工”。殷墟之所以存在“世工世族”、“工商食官”现象，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一方面，它说明，即使是血缘社会血缘组织内部的“社会分工”也主要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也不是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的结果，而是史前晚期聚落组织不断大型化一体化导致需求范围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说明“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都是“贵族”享用的特殊制品，都是“官营手工业”的组成部分，也从来不会参与以谋利为目的大众化的地缘社会的区域性社会分工<sup>17</sup>。

第三，无理证明“文明”导致“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

为了证明“文明”已经起源，“探源”专家还毫无根据地摆出了中国“文明”导致“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的证据<sup>18</sup>。然而，这又是拉近中国“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并利用它们来证明中国的“文明”是合情合理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结果。

事实表明，所谓阶级就是地缘社会由社会独立的个人按地位和财富分成的群体或集团，这种群体或集团还分别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财富拥有不同的控制权。中国的考古表明，史前与夏商周时期并没有出现阶级，因为血缘社会根本不具备阶级产生的基础与条件。

一方面，血缘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都是集体所有，所以就不会出现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或生产资料使用权完全个人所有为基础的社会的独立个人。

另一方面，在血缘社会，所有血缘组织不仅是一个血缘群体，也是一个共同生产生活的利益群体，所有的人不仅都是亲戚而且都是战士，每一个成员，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为所在组织的利益而浴血奋战，并共同享受由此而获得的利益。正因此，血缘组织内部只有等级，而无阶级。夏商周时期也是如此。在殷墟后岗墓地，那些除了一具骨架以外空无一物的小墓之所以还会与那些“中字形”、“甲字形”的大墓簇拥在一起<sup>19</sup>，就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血缘组织的成员，生死与共。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根本不存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不能用阶级压迫和剥削来理解和表达。诚如恩格斯所言：“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与奴役的余地”<sup>20</sup>。

<sup>16</sup>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40—298页。

<sup>17</sup>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38—298页。

<sup>18</sup> 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北京：《求是》，2020年，第2期。

<sup>19</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sup>20</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4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考古还表明阶级的出现与“王权”的出现也并不同时，也不是互为出现的基础和条件。一方面“王权”的出现先于“阶级”，夏商周即如此，就只有“王权”而无阶级；另一方面，“王权”的出现完全是社会一体化的结果，是血缘社会出现具有统一领导和管理特征的“高于部落”的“政治组织”的产物；而“阶级”的出现则完全不同，是社会地缘化的产物。

正因此，“阶级”与“王权”的出现既不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和条件，也不是文明起源顺便带来的特殊社会现象。

## （二）关于苏秉琦先生有关理论和思想的实用主义问题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最伟大的杰出的考古学家，他的一生都在思考和寻找如何利用遗迹遗物，“见物又见人”，复原历史研究历史；即使是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理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建立考古学文化亲疏关系的系统，而是拉进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的距离，并在深入思考和寻找史前人类历史的载体和平台。与此同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总是继承和发展并行，从来不会将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或对号入座或抄袭。1991年，他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倡议，并指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主要内容是讲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侧重于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sup>21</sup>。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时间，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满天星斗”、“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等宏观特点的思想与理论，不仅用中国考古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探索与研究。

然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虽然就是在苏先生“重建中国史前史”倡议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工程的实施与收获却表明，“探源”不仅距离苏秉琦思想遥远，而且还对苏秉琦思想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能用的用之；另一方面，不好用的先改后用；再一方面，不能用的全部抛弃。

### 1、能用的用之。

2010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一文中，“探源”专家关于考古学文化与文明起源关系的论述，即“中华文明的形或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各文化的区域特色还暗示了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显然，这里的论述就与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以及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思想比较契合，所以就利用了

### 2、不好用的先改后用。

1997年，苏秉琦先生正式就中国的文明起源提出了“满天星斗”的理论与学说<sup>22</sup>，其基本的要义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有自己平等、独立和独特的贡献。应该说，苏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得到了考古工作者、历史方面学者的广泛认同和赞许。

然而，却有一些学者在强调文明起源“多元”的时候，还特别重视“一体”的问题，因而就将“多元”改造成为了“多元一体”<sup>23</sup>，并认为从自然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中原文化的吸引力，以及中国史前各地文化的向心性结构等方面，都显示了中国文明起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为了将以往个人的学术观点变成“探源”的国家观点，“多元一体”还成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特点，并经历了“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两千年转型”等七个阶段，同时还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sup>24</sup>。

然而，历史与考古共同表明，史前是血缘社会，所有的血缘组织都是独立平等的组织，根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冒出“一体”的需求和愿望，即使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形式也不会促使人们拥有“一体”的需求和愿望，那种以为距今一万年就开始“一体”奠基的观点实在是证据难寻。

显然，对苏先生“满天星斗”观的改造表面上是发展了苏秉琦思想，实际上与苏

<sup>21</sup>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北京：《考古》，1991年，第12期。

<sup>22</sup>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5—106页。

<sup>23</sup>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年，第3期；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北京：《文物》，2000年，第1期。

<sup>24</sup> 孙自法：《中华文明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国考古网，2013年8月27日。

秉琦先生对问题认识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苏先生强调的是“多元”，改造者强调的是“一体”，并利用“探源”工程提升了自己认识的地位。

### 3、不能用的全抛弃。

(1) 抛弃了苏先生要全方位复原历史的思想。

苏先生的“重建中国史前史”实际“主要内容是讲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侧重于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探源”工程根本不提不谈史前社会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等全方位的复原问题，而完全是直奔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最早时间而去。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史前社会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问题都没有任何重大突破，谁也不知道起源的社会背景与特点的历史与学术前提下，“探源”工程却居然找到了中国文明与国家最早起源于“距今5000年”的答案？

(2) 抛弃了苏先生的“文明”观。

关于文明与文明起源的探索，苏秉琦先生完全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充分体现了尊重考古发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先生不仅没有将国家与文明起源混为一谈，而且透过有关的考古发现还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步超过万年”<sup>25</sup>。1991年8月，在《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sup>26</sup>一文中，他说：“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样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簪以外，玦、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同年12月，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的论述中，他又进一步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sup>27</sup>。苏先生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最早且充分肯定了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但是，“探源”工程既没有接受苏秉琦的思想和观点，也对中国的考古发现熟视无睹，还毫无事实根据地将国家与文明起源混为一谈，将国家的起源当作了文明起源的标准，还用实用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sup>28</sup>。

(3) 抛弃了苏先生的“古国”观。

关于“古国”的概念是苏秉琦先生1985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重点和大课题》<sup>29</sup>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并认为古国“是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虽然由于时代早各方面资料的局限，苏先生的定义有并不完全清晰的意思，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古国”的思考与认识，其中有二点非常值得后人重视。第一，“高于部落”之上，这意味着，探讨国家的起源一定要从血缘社会入手，从部落入手；第二，“政治实体”，这就意味着古国不同于以往的血缘组织。然而，“探源”工程完全抛弃了苏秉琦先生的思想，只追求探得“古国”的出现时间，至于所探得的“古国”是何性质有何特点则完全与苏先生的不同，一不是从血缘社会崛起的，二也不是一种政治组织和实体。

### (三) 关于西方欧美流行理论的实用主义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苏秉琦思想都是“老旧”的理论学说，而且实践也早已证明利用马克思主义苏秉琦思想要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探到中国文明与国家之源几无可能。所以，当代西方欧美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不仅在中国大受欢迎，而且很快就实现了本土化。

20世纪以来西方欧美的考古学经历了二个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二次大战以前，考古学界流行马克思主义，并出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澳裔英籍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 Vere Gordon)就是代表。但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类风气与学者至今根本不见。究其原因，关键就因为当时崛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

<sup>25</sup>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19页。

<sup>26</sup> 苏秉琦：《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苏秉琦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sup>27</sup>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北京：《考古》，1991年，第12期。

<sup>28</sup> 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北京：《求是》，2020年，第2期。

<sup>29</sup>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重点和大课题》，沈阳：《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

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考古学就要划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理论的界限。从此，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

受这一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由于他的《古代社会》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基础；所以他，虽然并不认识也没有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但他在书中关于人类早期血缘社会形态与组织、组织形态的研究成果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并被束之高阁。为什么同为美国人的戈登·威利（Gordon Randolph Willey）关于秘鲁维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组织形态都套在他们头上，还用以描述历史。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摩尔根有关研究的合理性，还以假乱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原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被中国考古学毫无顾忌地引进了，而且还成为了“文明探源”的主要理论方法；还完全中国化了，一是区域内哪个规模面积大还特别有内涵哪个就是区域之王，二是“重点地区”出现了“中心聚落”与“卫星聚落”。

2006年，“探源”专家在《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sup>30</sup>一文中指出：史前“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古代都城）。它往往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对中心聚落（包括夏商周时期的都城）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点”，“出于为中心聚落中的显贵们服务的需要……卫星聚落一般都位于中心聚落的周围……”。

然而，“探源”专家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重点地区”，衡量重点地区的标准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中心聚落”是血缘社会的，还是地缘社会的？是血缘或地缘社会中哪一级的？更没有说清楚“中心聚落”与“重点地区”，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系？为什么无论血缘和地缘的“中心聚落”都是“重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原因？

显然，这是根本不考虑史前血缘社会复原问题而一味用地缘社会才有的“区域”观念和思想来理解古人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也是目前中国聚落考古和文明探源工程最严重失真的思路与方法，只要是大遗址，只要里面有大型宫殿、祭坛、大墓、礼器等“内涵”，就是“重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是区域的“王”，就与“古国”有关。至于这些“中心聚落”与血缘社会的联系，与复原史前社会的联系，根本无人问津。

实际上，这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凡是与复原有关的一律免谈，而只要能帮助工程又快又简单地找到中国文明和国家之源，就用谁的理论。

然而，中国的史前考古表明<sup>31</sup>，“探源”找到的“古国”起源时间，找到的所有古国，包括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巩义双槐树、湖北天门石家河，由于确认的标准都是遗址面积大特别有内涵，至于是否“高于部落”，是否是“政治组织”，皆无言以对，所以工程里没有一个“古国”是真的。

特别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从早到晚都不是“古国”所在地。

2009—2010年，考古工作者就完成了临汾盆地的聚落遗址调查，并发现在塔儿山以北涉河南岸有一个从早到晚都比陶寺实力强悍的聚落集团，从而显示位于塔儿山北麓的陶寺遗址的早中期，虽然城址面积规模大有内涵，但根本没有击败他人和统治他人的实力，因而根本不可能逾越族群的界限而成为统治他人的古国。陶寺晚期，由于城址败相突出全国一流，不仅城墙、宫殿、观象台都被人捣毁了，祖宗大墓被人掘了，甚至城内的男人很多都被人砍了，扔进了灰坑里<sup>32</sup>；所以更不可能是统治他人的古国。

可是，为了让陶寺永远保持黄河流域文明与国家起源象征的地位，“探源”工程只字不提陶寺晚期的结果，而是专注渲染陶寺早、中期的重要性。为此，最为有用的理论就是“区域聚落形态”，就是哪个大哪个有内涵哪个就是“王”的理论。至于那个早晚一直都在陶寺对面，威胁陶寺，并可能灭了陶寺的聚落组织，在以“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探

<sup>30</sup>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北京：《文物》，2006年，第5期。

<sup>31</sup>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sup>32</sup> 何弩：《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源”工程里将永远被人为忽视和埋没了，将永远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实用主义的历史长河中。

### 三

今天，要抑制要纠正中国考古学还在不断蔓延的实用主义风潮，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必须回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苏秉琦思想，以人为本，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正轨上来。

勿容讳言，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都有再发展的余地，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农村包围城市”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考古也是一样，既要坚决杜绝教条化和对号入座，又要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继续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史前和古代遗址被发掘出来，为人们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还原历史研究历史，一方面自觉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中国考古人和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那种貌似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外衣，实际皈依了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苏秉琦先生复原历史研究历史最宝贵的学术思想就是以中国考古发现为本独立思考。他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颠覆了几千年以来中国历史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他对文明的认识不仅没有禁锢于传统的观念，更显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充分体现了世界“东方天国”<sup>33</sup>的自身特点。20世纪90年代，虽然西方欧美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传入中国并开始流行。但是，苏先生从不盲从，而始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国家“是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一方面又有根有据地将文明与国家区别开来。事实上，苏秉琦先生早已为中国考古人树起了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大旗，中国考古人理当继承和发扬光大。

不过，相对理论的思考与总结，中国考古学目前最大的学术困难就是找不到具体利用物质遗存复原血缘社会研究血缘社会的大门和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考古的已有发现和探索表明，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的研究就是理解和认识血缘社会特点与历史的金钥匙，还是考古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突破口。

历史证明，群聚一直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特点。史前血缘社会，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群聚在血缘组织中；历史时期，人们以地缘为纽带，以民族为单位，群聚在一定的地区之中，我国现有5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即如此。

考古还证明，从旧石器早期开始一直到夏商周时期，人类就一直存在以居住地为单位以血缘为基础近距离相聚的群聚现象<sup>34</sup>。

这种群聚现象既是人的自然属性使然，是人类的自然行为，是一种天性；也是人的社会属性使然，是当时人类组织以血缘为纽带，实行普遍的“族外婚”、“走婚”、“对偶婚”，以及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并相互保护共有的食物资源地与耕作土地、水资源地等社会需求的结果。此外，史前时期社会生产力相对较低，人数的多寡本身就是生产力大小的主要标志。因此，有条件的组织起来，以小变大，加强互助，不失为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一种最佳选择。

根据前苏联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的调查<sup>35</sup>，中国詹承绪、严汝娴、宋兆霖等云南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的调查<sup>36</sup>，韩军学先生云南佤族的调查<sup>37</sup>，童恩正关于非洲尼日利亚蒂夫人（Tiv）社会组织的简介<sup>38</sup>，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调查<sup>39</sup>，史前社会就是一个血缘社会，聚落就是聚氏族而居的居住地与场所，近距离群聚就是血缘组织的基本特点。因此，聚落群聚形态就是血缘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的物化反映。

<sup>33</sup>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

<sup>34</sup>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66页。

<sup>35</sup> C. A. 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sup>36</sup> 詹承绪等：《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sup>37</sup> 韩军学：《佤族村寨与佤族传统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37页。

<sup>38</sup>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sup>39</sup>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此外,考古还显示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sup>40</sup>。

距今约3百万—8千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由于地广人稀,人类的食物全部都是自然食物,所以当时社会发展的矛盾主要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居住地及其组织的群聚形态都以血缘为基础,相互独立平等,分布稀疏。

距今约8—6千年,新石器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由于人口增加和农业的兴起,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居住地及其组织的群聚形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力开始成为新型的组织纽带。在实力的基础上,聚落之间一方面出现了地位等级化,出现了主从关系,有实力的聚落成为了部落的核心<sup>41</sup>;另一方面,聚落群及部落也首先开始基于实力一体化,变各成员相互独立平等为统一领导和管理。

距今约6—5千年,新石器晚期中段。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聚落群的一体化再次升级,核心聚落由环壕(濠)聚落变成了城址<sup>42</sup>。

距今约5—4.5千年,新石器晚期晚段。为了应对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聚落组织在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始大型化和分布紧凑化,出现了抱团相聚的新式的一体化聚落群团,以往关系松散的临时性部落联盟不仅开始成为永久性联盟,而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种“高于部落”之上的“政治实体”,有实力的聚落群开始成为永久性部落联盟与“政治实体”的核心聚落群<sup>43</sup>。

距今4.5—4千年,新石器晚期末段。由于矛盾进入到不可调和的阶段,所以社会同时崛起了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等新型一体化超大型聚落组织,有实力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开始成为这些组织的核心<sup>44</sup>,整个社会也开始由血缘向地缘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还显示,中国史前的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不仅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是同时期人类社会各种历史活动与发展变化的载体和平台。

距今约3百万—8千年,以自然的聚落群为历史主角。

这一阶段人口相对稀少,自然的聚落群或部落就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实体单位,相互独立平等;流行采集和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流行集体劳动集体消费的自然生产方式,流行自然的“族外婚”<sup>45</sup>;除了临时性的部落联盟以外,也不需要永久性的部落联盟;所有的遗址和聚落之间没有一个有标志地位和等级的遗迹与设施。

距今约8—6千年,以环壕(濠)聚落为代表的一体化聚落群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随着人口与聚落的大量增加,生产性经济逐渐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这一阶段的聚落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一方面,实力成为血缘之上新的组织纽带,各成员之间出现了等级分化,出现了主从关系,实力强劲的核心聚落还开始享受环壕(濠)的保护<sup>46</sup>;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开始等级分化,高等级的人开始拥有了奢侈品玉器<sup>47</sup>、绿松石<sup>48</sup>制品,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门制作奢侈品的特殊手工业与分工;再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血缘集体的范围内,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以耕作权私有为特点的个体劳动和个体经济<sup>49</sup>。

距今约6—5千年,以城址为代表的一体化聚落群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变革更加广阔,核心聚落不仅由环壕(濠)聚落升级为城址,而且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普及并成为血缘社会最小的组织

<sup>40</sup>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sup>41</sup>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唐户遗址裴里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北京:《考古》,2008年,第5期。

<sup>42</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sup>43</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报告》,武汉:《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sup>44</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武汉:《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sup>45</sup>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43页。

<sup>46</sup>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唐户遗址裴里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北京:《考古》,2008年,第5期。

<sup>47</sup> 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8000年前精美玉器》,北京:《文物天地》,2002年,第1期。

<sup>48</sup> 蓝万里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第八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北京:《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7日,第8版。

<sup>49</sup> 裴安平:《史前私有制的起源与发展——湘西北澧阳平原个案的分析与研究》,《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与经济单位。

距今约 5—4.5 千年，以内外双城城址为代表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为了应对社会矛盾激化升级的时代挑战，以往相互关系松散的临时性部落联盟即聚落群团开始在利益的基础上重组与整合，并在实力的基础上改造成了一种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的一体化聚落群团。随着这种全新社会组织的诞生，人类社会的变革更加深刻。一方面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代政治中心的崛起，从而导致“贵族”的出现，导致“礼器”的出现；另一方面，在聚落群团血缘组织的范围内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城乡分工”；再一方面，同一社会组织的核心也出现了分级，一级是核心聚落，可以住在内城里；二级是核心聚落群其他成员，可以住在外城里<sup>50</sup>。

距今 4.5—4 千年，一个以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为历史主角的时代。

由于社会矛盾开始进入你死我活的时代，从而导致聚落社会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同时出现了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等新型超大型聚落组织，社会一体化的范围第一次从血缘跨入地缘；另一方面随着内部各聚落组织之间统治关系的建立，具有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特点的古国的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劳而获的生存模式；再一方面城址大型化更加明显，出现了一个聚落群团集体居住的城址<sup>51</sup>，还出现了一个聚落集团集体居住的城址<sup>52</sup>。

显然，回眸中国的史前史不难发现，聚落的群聚形态无论哪一种类型都并非置身于历史之外的怪物，而是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产物。一方面，它的形态演变历史无一不与重大的历史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各种历史的重大事变又无一不是在这个载体和平台上的演绎和展开。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方面认为聚落的分布就是一盘散沙，但另一方面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又跟在欧美“区域聚落形态”理论的后面，认为史前晚期聚落之间出现了地域性的“社区”和“社群”，出现了“中心聚落”和“卫星聚落”。但实际上，中国的考古早已表明欧美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基于血缘的氏族社会，就有基于血缘的聚落组织与组织形态，聚落群聚形态本质上就一直是血缘社会组织形态的物化结果和反映<sup>53</sup>，是历史演变的载体和平台，也是考古学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的必由之路。

## 结束语

今天，中国考古学之所以实用主义畅行无阻影响广泛，这不仅是学科本身缺少研究理论和思想的反映，实际也是不良理论和社会风气正在侵蚀中国考古学灵魂促使学术腐败和堕落的表现，是重名利的追求而轻默默无闻研究之风的反映，也是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从未有过之现象。值得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警醒。

今天，也是中国考古学痛定思痛，摒弃习以为常的实用主义，摒弃对权利和面子的矜持，摒弃慧外秀中华而不实，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苏秉琦思想，开创聚落群聚形态研究新局面的基础上，脚踏实地的“以人为本”做好基础研究，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sup>54</sup>。

<sup>50</sup>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6 年，第 30 期。

<sup>51</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北京：《文出版社报》，2005 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北京：《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8 版。

<sup>52</sup>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年。

<sup>53</sup>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sup>54</sup>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北京：《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